

当代电视剧中的市民价值意向*

□王玉玮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叙事在中国当代电视文化中的兴盛。部分电视剧对市民的日常生活有着深刻而又精细的世俗化展现,但又不拘泥于浅显的生活层面,而是在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地对日常生活的温情进行着解构。

关键词:电视剧;市民;价值意向

Abstra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uses the rise of Chinese townspeople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of daily narrative works in China's contemporary TV play culture. Some of TV plays have deeply, delicately and secularizedly shown the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it is not constrained by the surface of life but successively deconstructed the warmth from daily lif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V play; citizens; value intention

中图分类号: I2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89(2006)06-0900-03

20世纪80年代,荧屏上就曾涌现出《京都纪事》、《四世同堂》等以都市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影视佳作。90年代初,伴随着《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的播出,中国电视剧才由此真正发出了市民阶层的声音。随后,大批以市民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相继出现,如大型室内剧《爱你没商量》、《皇城根儿》,家庭伦理剧《儿女情长》、《大哥》、《大姐》、《咱爸咱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地鸡毛》、《浪漫的事》,情景喜剧《中国餐馆》、《我爱我家》、《起步停车》、《候车大厅》、《闲人马大姐》。这些电视剧以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市民在时代和社会变迁下的种种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

一、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建构

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都市场民叙事在中国当代电视剧中的兴盛。一部分电视剧开始从市民立场出发,采用民间叙事话语来界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希冀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来表现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况。导演黄建新曾说:“每个人的行为心理都是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根就在现在,就在每个人身上。”英达说:“‘情景喜剧’是有它独有的规律和机制的,并不能依靠灵感在某一时间突然到来。……我有很多剧的蓝本是从国外刨过来的,但我得花很大功夫把它本土化,我让它‘低’点,再‘低’点。老百姓才能懂,会笑。”这种将创作主体等同于老百姓的民间写作立场,其实就决定了影视艺术家们放弃了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以及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将视角转向于个体的、现实主义的、世俗的生活追求上。其实,日常生活并不需要依靠外在的思想拯救,它的价值不在任何理想化的超越之中,而是在于世俗性的日常本身: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家庭人伦……这些烦琐的世俗性细节在现实生活中是无从缩减和省略的,它们构成了民间生存的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用阿格妮丝·赫勒的话来说,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个人实用

主义”的特征^[1]。这个“个人实用主义”不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概念,它是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表现,是人性的一部分。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原色人生”。刚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小林,意气风发,个性十足。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却四处碰壁、烦恼丛生:在家庭中,排队买豆腐有烦恼;求人给老婆调工作有烦恼;送小孩入托还有烦恼。在单位,同事间相处有烦恼;入党、提级、长工资有烦恼;跟领导要房子更是“恼不胜恼”。荧屏通过平凡、琐碎、细微的细节揭开了蒙在日常生活上的政治、伦理的帷幕,展现出“原汤原味”的生活真实,给人们以“生活怎么是这样”的惊疑,毫无人为痕迹的“实录”。《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以北京古旧胡同里的一个众生云集的大杂院为生活舞台,将张大民的一家三代十几口人的生活与生存状态细腻地展示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狭小、僻陋得可以称得上是寒酸的生存居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似乎没有任何私密的物和事可以保留,有的只是婚丧嫁娶、祸福凶吉,乃至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等物化世界与精神生活的资源共享。在这种日常叙事中,各种理想、绝对价值都播散在凡人小事、日常琐屑之中而趋于湮没,而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荧屏中则有力地凸现出来^[2]。

别林斯基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哲理:一类是学究式的、书本的、郑重其事的、节庆才有的;另一类是日常的、家庭的、习见的,这两种哲理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接近,只要谁想描写一个社会,他就必须认识这两种哲理,尤其是必须研究后一种。”^[3]都市场民社会是一个以日常生活做底子的恒久的世界,它的特征是不管社会变动、政治因素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始终保持着它完整的生活逻辑与体系,维系着它们长久保存下来的精神向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反映家庭生活底蕴的伦理剧相继出现,如《渴望》、《大哥》、《结婚一年间》、《孽债》、《儿女情长》、《婆婆媳妇小姑》、《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等等,

* 收稿日期:2006-04-03

作者简介:王玉玮(1973—),男,江西余干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美学。在《电视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制作的专题片《有声世界的无声舞者》、《天津女排大事记》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

这些剧作表现的大都是普通市民生活中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日常琐事,诸如“姑嫂之争”、“邻里计较”,而正是这些日常琐事才真正构成了市民阶层的最真实记忆。《大哥》展示了城市下层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状态。这是关于一个城市家庭中,一位父亲和他五个子女的故事。父亲陈世荣瘫痪了,实际上已失去了家庭主宰的位置,大哥陈文海成了“准父亲”,他要维系这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他的兄弟姐妹们每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各自坎坷的命运,而这一切都要由他这位大哥去慰藉、去解决,他还有自己的小家,妻子的下岗和自身的疾病都困扰着他。与很多都市题材电视剧不同,《大哥》把目光对准了都市中极为普通的群体,揭示出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这样的主题。该剧情节没有过多戏剧性的编造,而是把创作的视点聚焦在一个普通小院人家的日常生活,让观众通过对一些细节的欣赏获得感动。英达导演的《我爱我家》、《中国餐馆》、《闲人马大姐》情景喜剧的风格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许多题材都取自老百姓家长里短的事儿。《我爱我家》用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来表现普通百姓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使观众看到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的现实生活,体现了剧作家们一种平民化的创作态度,一种充满关怀的人文意识。

市民题材电视剧以关注市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事为切入点,着重于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展现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世界,丰富了都市市民生活的表达。然而,有些电视剧过分注重描摹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使得故事太流于表面而不深刻,从而没有真正触及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本质内涵。

二、欲望追逐中的价值迷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使这个长期蛰伏、久被遗忘的艺术概念跃出地表,为中国当代电视剧拓展出一方古老而又清新的理论阐释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一个粗鄙化、原生态的,而且还显示出一种强大、自由的生命与文化力量,在颠覆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钳制与精英知识分子启蒙训导之后,在“官方的彼岸”(巴赫金语)建立一个鲜活的文化生活空间。马克思对这个空间中的市民人格特点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是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是世俗的存在物,这种人是“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是“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4]因此也可以说:“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5]90年代前后,《过把瘾》、《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撒把》、《编辑部的故事》、《顽主》等影视剧共同复活了一个传统的市民社会,及其承载了市民生活理想与价值观念的“市民意识形态”。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的一系列“痞子”形象,他们或以“玩”和“游戏”作为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或通过不动声色的“调侃”和“戏谑”将旧有的价值体系拆卸得支离破碎,个人利益变成行为轴心,利己主义成为他们生存的最高原则。“一点正经也没有”(或“玩的就是心跳”)的“顽主”自视甚高却又在口头上自轻自贱,以戏仿的方法颠覆现存文化秩序。他们生活在市民中的底层,没工作、没地位、没受过大学教育,甚至还有种种作案前科,他们出入歌厅、饭厅、情场、赌场,他们玩人生,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颠覆了工作、学习、婚姻、家庭、道德等一切规范和秩序。这些剧作借助经常把“庄严”的词汇用于琐屑的日常经验,表达出

一种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困境既了如指掌又一笑置之的游戏心态。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价值系统无法给人提供这种精神终极意义,所以顽主们在追求现世享乐、放纵欲望的同时感受到灵魂的空虚与苍白,“物欲”和“情欲”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世俗性的享乐文化成了这个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趣味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在《费尔巴哈》中概括得更具体而清楚:“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生产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由此可见,市民社会被赋予了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相联系的经济基础的价值意义。在都市题材电视剧中,观众轻易就能看到都市市民欲望追逐中的影子,金钱已经成了支配一切的杠杆,清高、道义、爱情、坚忍等传统价值所肯定的品格,在它的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来来往往》、《口红》以及根据《小姐你早》改编的电视剧《超越情感》等,开始“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之间的惊世艳情,由柴米油盐的烦恼变成了男欢女爱的战争。”^[6]在《来来往往》中,康伟业获取经济资本后,得到了自己渴慕已久的白领丽人——林珠,然而高雅的林珠由于与康伟业在生活方式和生活关系上不能完全认同,最后离开了康伟业,并把康伟业赠送的房子卖掉,携款而去。林珠的选择,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生存法则,早已没有了传统文学作品中所常见的知识分子的清高了。《超越情感》中国家粮食部副研究员戚润物无意间撞见了丈夫王自力与小保姆的私情,痛不欲生。后一连六次到歌舞厅追踪观察王自力的行止,终于彻底发现了王自力的不可救药。遂制订出惩罚王自力的计划让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于是,戚润物与另外两位同样遭到男子欺骗、抛弃、玩弄的女子李开玲和艾月携起手来并肩战斗,最终报仇雪耻、如愿以偿。《堆积情感·男人篇》则展开了三个发迹男人与那些似乎一直等待着发迹男人的女人之间的情感游戏,大款看上了漂亮女演员,把她从男友那里“抢”来,女演员半推半就地投入大款的怀抱,在一段大款、美女、豪车、华服、美食、空虚、寂寥混合出来的生活片断之后,女演员又回到前男友身边,然后又开始思念大款。人物和她的灵魂在人际间如漂萍浮动,没有审美立场与态度,批判的缺席在诱导着物欲、情欲泛滥的时代“新时尚”。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型和竞争型的经济,它既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亦诱发人性丑恶一面的恶性发展,若没有良好的社会机制制约,则将使拜金和唯利是图的风气蔓延,而形成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局面。电视剧《空镜子》以孙燕羨慕姐姐美丽能干的画外音开始,而当电视剧到了结尾,长相平平的妹妹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曲折坎坷之后,终于以自己善良的心地,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纯真的感情;美丽聪明的姐姐却因为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把握不住自己,在自己欺骗生活的同时,也被生活欺骗了,只能在除夕之夜看着相亲相爱的妹妹一家,百感交集。齐奥尔格·西美尔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的。”^[7]以金钱为核心的世俗价值体系在经济文化语境中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观众也必须看到,这种世俗价值体系仅仅地大多滞留于物质欲求层面,取消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更抹杀了人的一切精神性追求。

三、都市场民精神的温情表达

知识精英“大写的人”的价值话语往往具有抽象性和

概念化的特性,与之相比,自然滋长的民间精神则富有鲜活的人性血肉。在自足自律的都市民间生活空间里,人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也不再接受启蒙话语的诱导与教化,人的生存是一种出于自然人性、自生自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蕴涵着踏实柔韧的世俗生存精神以及那种在平凡而艰辛的岁月中建立起来的普通而又深沉的情感。近年来的电视剧中,就有不少作品在自觉地发掘着这种本真的民间精神元气。电视剧《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以朴实的风格、平平淡淡的节奏显示出普通市民日常的人生、日常的体验、日常的欢乐和痛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镜头里充斥着胡同、里弄、大杂院、筒子楼的空间影像。主人公张大民是为物质生活而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伟大的理想,没有超凡的品格,生活的目标是直接而简单的物质目标,也许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有爱情有亲情,即使他们什么都不信,还可以相信这张贫嘴带来的心灵慰藉,贫嘴的光芒也照亮了为生活而忙碌的人生。张大民在挫折、局促的境遇里“痛并快乐”地显示着他的生动,他“为了生活,一直在努力”的人生态度和他以乐观幽默化解万难的个性,一时间焐热了百姓的心窝,许许多多的平民百姓从电视剧中找到了自己,于是有了随着电视剧每日播出的街谈巷议,这让人想起作家刘恒所言——“小人物的基础是最大的”。《大哥》也承袭了《渴望》、《儿女情长》、《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平民剧作品一贯表现出的平民心态:承受、容忍和期待。这既是下层小人物的一种无奈选择,也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生活韧性的体现。在物欲横流,心态失衡的现代社会,大哥不嫉妒、不贪婪,凭借辛勤工作,安享自己一份困窘而自尊的生活,将生命的意义放置在日常生活中,细细咀嚼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亲情,使平凡的生活呈现出温馨的亮色。诚如导演王栋、潘明光在导演阐述中所说:“把视点聚焦在一个普通家庭,用一个个我们身边的故事反映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迫切性。”^[23] 集连续剧《咱爸咱妈》是一部“以一个家庭为主线,辐射整个社会之人情、伦理、道德”的剧作。全剧通过大量撼动人心的细节,表现乔师傅的四个儿女在照顾不幸身患癌症的父亲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事情和种种人物性格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百态,让观众为乔姓一家人身上所体现的既平凡又伟大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并因这种精神让我们看到生活大有希望。《儿女情长》讲述的是在上海石库门一带的旧弄堂里发生的故事。年迈的童家老夫妇有6个子女,子女们各自成家立业,过着忙碌平淡的生活。一日,童老伯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从此瘫痪在床,需要儿女轮流照料。正当一家人为父亲忙碌奔波之时,母亲又被查出患了不治之症,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剧作由此出发编织情节,展示了童家子女在父母相继患病后所表现出的那种血浓于水,互相关心、互相体贴的父子情、母女情。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 都市生活方式是由都市人的“生产方式”和他们所具有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都市生活所特有的,也是模仿不来的。都市日常生活是承载和拥

抱都市民间意识的现实主体,不管现代都市面貌的变化如何翻天覆地,日常生活作为都市置身其间的现实生活的汪洋大海,它所遵从的“日复一日”的自然时间逻辑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易于涵纳那些接近于人性本源的精神表达主题,如原始正义、民间情义的审美原则等等。《渴望》中的刘慧芳应该是“集中国传统美德和与这种美德并存的、至今尚未消亡的传统弱点之大成”,她本身堪称中国市民大众视野中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她的含辛茹苦相夫教子,还是她性格当中的隐忍、含蓄、从容、平实、刚强、善良、热情、质朴,无不与中国市民文化图景相吻合。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市民阶层而言,改革开放“不仅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和创造空间……他们企图跻身于创造主体的行列,去构筑和宣传属于自己阶层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9] 《我爱我家》中表现的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社区中的环境,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宅,楼下小区公园内的长凳、路灯,居委会的活动,晚上下棋的老头和拿着扇子乘凉的人们,还有“我家”内的家具摆设,都深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这种社区生活充满了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荧屏上那些熟悉的场景和同样熟悉的语言,都让观众感到无比的舒心和放松,观众也因为了解而喜爱,因为相似而兴趣盎然。《嫂子》、《大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剧饱含深情地走进了那群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让市民的生活里从此多了份对顽强、宽厚的大哥大姐的发现与回忆,也让观众多想起了一些对人生有警醒作用的真实的过去。因此说来,这些市民题材电视剧向观众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挫折、失败、苦难、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失去乐观向上的心态。热爱生活,这是浪漫的必备条件。只有乐观,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才来得真实、具体和丰富,才能品味出生活中的浪漫。

市民价值取向作为市民文化的观念形态,它既有质朴刚健的精神和自由自在的品格,另一方面,又裹挟着城市平民这一阶层所特有的享乐主义、情欲主义、逐利主义的糟粕和污垢,呈现为一种美丑并存、善恶交织、瑕瑜互现的复杂的文化形态。这就要求电视艺术家在挖掘民间精神时,必须对其进行现代性的审美提升,使其剥离粗俗化的形而下状态,真正地展示出当下都市市民内心深处的价值信仰。

参考文献:

- [1] [匈]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
- [2] 单世联. 寻找反面[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57.
- [3] 赵津晶. 当代电视节目平民化探讨[J]. 新闻前哨,200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5-346.
- [6] 刘川鄂.“池莉热”反思[J]. 文艺争鸣,2002(2):41.
- [7] 齐奥尔格·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8]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
- [9] 陈炎. 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格局及其转化模式[J]. 天津社会科学,1997(6).

